

目 录

忆青年时代的周逸群同志·····	李侠公 (1)
陈赓旅长在神头岭·····	蒋开印 (21)
长征过贵州的回忆·····	张 量 (25)
回顾稷山抗日游击支队·····	陈捷弟 (35)
忆念黄齐老·····	堵述初 (44)
回忆白铁肩先生·····	杨竹芬 (52)
严修在贵州·····	马凤程 (64)
忆苗族人民的好儿子刘兴文·····	张景录 (81)
著名苗族歌唱家——阿泡·····	冀洲 韩乐群 (94)
清末民初几个政治事件的见闻·····	桂百铸 (108)
清末贵阳师范学堂成立和解散经过·····	金峙青 (119)
——兼忆乐嘉藻先生	
贵州优级师范选科琐忆·····	韩汝烽 丁宜中 (125)
“五四”运动在贵阳见闻点滴·····	肖子有 贺梓侨 (130)
难忘的峥嵘岁月·····	甘凌杰 (135)
——记解放前夕在国民党监狱中的斗争生活	
袁祖铭“定黔”纪实·····	林子贤 (148)
毛光翔主持黔政的回忆·····	杜叔机 (164)
民初贵州劝工局创办始末·····	尹赞卿 (177)
抗日战争中的南洋华侨青年回国服务团·····	许志光 (188)

戏剧家熊佛西在遵义·····	邱 玺 (189)
独山陷敌两日记·····	(194)
黔南事变的一段惨痛回忆·····	王家修 (202)
贵州食盐运销的回忆·····	伍效高 (206)
我在铜仁主持竞选“国大代表”的经过·····	杨干氏 (219)
一九四五年三都的水灾·····	王品魁 (233)

忆青年时代的周逸群同志

李 侠 公

周逸群同志是我们党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是在第一、二次国内革命战争中建立过功勋的革命先烈。逸群同志的业绩开始于二十年代，我现在仅把这个时期同他一起生活，一起工作的情况写出来，当作对先烈的一点怀念，也许对今天生活在我们伟大时代的青年们在学习革命传统、提高爱国主义和共产主义觉悟方面，有些帮助吧！

逸群同志，贵州铜仁县人，于一九一九年秋间去日本留学，进东亚预备学校，一年后，考入庆应大学经济科。我同他结识，就是开始于这个时期。逸群同志性格刚毅朴实，给人以沉静寡言之感，但一经接触到某些重大问题，认为有必要发抒意见时，就会放言纵论，给人以健谈豪爽的印象。我们同去日本留学，正面临着国内外的大风暴时期。国际帝国主义同国内封建主义相勾结，日益造成军阀混战、民不聊生的悲惨局面，影响到留学生不能得到安定学习的生活。来自川滇黔三省的留学生受到的厄运更甚，三省军阀政府对于公费留学生应汇寄的学款也扣留或延宕不寄，常积欠数月之久；自费留学生也因汇兑阻滞，同样受困。于是，三省留日学生集会讨论了这个迫切的生存问题，在纷纭争议中，逸群独排众议，一针见血地指出：问题的中心是大小军阀忙于争夺地盘的混战，不顾学生死活所造成的。他主张留学界团结起来，组织力量就近向中国驻日公使馆理论，同时要取得

留日学生总会的声援。他还建议立即行动，把三省学生组成为三个小组。在每组推举代表三人后，推定逸群同志为总代表，并决定翌晨出发。届时，逸群同志率同代表们前往公使馆，其余群众集中在神田区中国青年会等候情况。代表们到公使馆后，几经交涉，终于迫使公使胡维德出面接见。这个北洋军阀系的官僚，最初想要油滑手腕应付过去，但终究经不起总代表逸群同志锋利的说理质询，特别是胡维德知道还有留在中国青年会的众多群众作后盾时，他就被迫允许发放公费欠款和自费生的借款。我从这次小小的斗争中，认识到逸群同志的思想水平和组织才干，从而由衷地佩服了他。从此，我们结成了交道很深的战友。

逸群同志在学习上，不是读死书的。他在课堂作笔记，不象一般学生那样有听必录，而是在全神贯注的听讲中摘记其精华，所以他的笔记本都是大纲式的记录。他的学习兴趣，偏重在历史方面，又置重点于中外的近、现代史。而且，他还特别关心当前的时事政治。一九二二年暑假中，他回贵州铜仁家乡并经过贵阳，了解到许多情况。他回东京后，向我叙说在贵州的见闻，当时他那一种忧郁、激愤的情绪，至今我犹能清晰地回忆，他说：贵州省简直成了一个鬼世界，你从清晨走上街市，感受到的是一片阴沉沉的寂静，店舖紧闭，行人稀少，但一到夜间，却又喧嚣得令人头目晕眩，一些酒席馆生意兴隆，欢笑猜拳的噪音，震耳欲聋。然而僻街小巷，时见弃婴，还有无人收尸的路毙者横陈街头……。那时贵州的统治者袁祖铭，是北洋军阀的走卒，比起他前任的贵州军阀来，其剥削压榨老百姓的手段有过之无不及。袁祖铭肆无忌惮地强迫农民扩种鸦片，作为他扩充军队、发财致富的一大财源。吸食鸦片，公然成为上层社会的应酬手段，官场的头目们要在黄昏以后才躺在烟榻上商讨一省的“大事”。这样，贵州就成了一个白昼阴森、午夜“繁华”的鬼世界。记得逸群同志还用了这样两句话作为他这次谈话的结语：贵州如此，全中国



周逸群同志

不都是一样吗？

逸群同志一九二二年暑期回国，在上海逗留的时间较久，返东京时带来很多书刊杂志，他花了很多钱定购当时上海的各大报纸，约定按日寄到东京。从此，他在东京的读书生活中，阅读国内的报章杂志就占了他一部分时间。他受到当时党中央的机关刊物《向导》周报和共青团中央机关刊物《中国青年》的启发教育，进一步钻研马克思的学说。当时日本书店发行的进步书刊已不少，各大学的一些教授也趋赶时髦，大讲马克思。而逸群同志则是抱着追求革命真理的态度严肃认真地学习马克思主义。记得一九二三年春天，日本樱花盛开时节，逸群在同我一次谈话中，以斩钉截铁的口吻说：“我决定回国了。家乡如此！国家如此！过着这样读死书的留学生活，实在耐不下去了。”接着就问我：“你呢？”我蓦地听了这句话，一时答不上来。这时他又说：“你们学校比我们短少一年^①，现在已是你毕业的时间了。怎样？等着你毕业后，我们一起回国吧！”我当时联系到他平日向我吐露的愿当一名新闻记者以宣传民众、引导民众革命的抱负，就问他：“当新闻记者的事有门路了吗？”他说：“回国去闯。”这样，我们就在一九二三年十月间一同回国。到了上海，我们租了法租界善钟里的一间前楼居住。逸群家庭较富裕，一切必需的家庭用具，差不多都由逸群包下来了。他在东京时，我就熟知他的个性，是自奉菲薄而对同学和朋友的急难，却常常解囊相助，毫不吝啬；遇到有向他还钱的人，只要了解这个人的困难境遇，他总是婉言拒绝。

我俩在上海“定居”下来，就开始去“闯”作新闻记者的门

^①本文作者当时就读于日本明治大学，系三年制；周逸群同志所在的庆应大学经济科为四年制，故云“短少一年”。

路了。然而上海滩上，十里洋场，象我俩这样没有“大人先生”引进的学生子，能凭白无故地进入报馆当记者吗？结果我们投入社会生活的第一步设想就幻灭了。逸群淡然地对待这个失望，以坚决的口吻说：“我们自己来办报吧！”我诧异地问他：“有力量来办吗？”他说：“办不起大报；办个以贵州为对象的小报吧！贵州是一国的缩影，说贵州，很自然地会谈到全中国嘛。”他接着又说：“我们应该面对青年，就取名叫《贵州青年》吧！”原来逸群同志对一件事的考虑，总是要在脑子里盘算成熟之后才讲出来；他已考虑到办报的经费，说 he 可以从家里搞出一笔款子来。到了这年的冬天，逸群的叔父周自炳先生替他筹措了五百元钱汇来。记得他接到汇票的那天，喜得向我开玩笑说：“这下子，我们可以当上海的‘寓公’了。”他喜的是有了办报经费的基础，宿愿达到了。他于是约同我在逛马路时去租了法租界哈同路民厚南里的一间前楼，接着又分头约了几位我们认为是信得过的东京同学来一起工作。这中间就不是那么顺利了。有两位贵州的同乡，一位是还在日本帝国大学专修教育的，一位是刚毕业早稻田大学搞文学的，他俩就不是那么积极，还劝说我们不如去大学教书为好。最后，得到三个赞助的人，一是上海复旦大学的鲁纯仁，一是日本帝国大学的张伯符，一是毕业于日本早稻田大学已在北京晨报馆任编辑的李仲公。这样，我们约集在沪的鲁、张，一共四人，商讨了发刊内容。我们决定发表《〈贵州青年社〉宣言》以代发刊词，并商定了宣言内容，推举逸群同志执笔。宣言内容摘录如下：

我们对于政治，主张：①促进真实的民主政治实现；②唤起民众底阶级的自觉，以与权力阶级对抗；③不持狭隘的地方主义，于解决贵州问题时，并企图解决国家问题。

社会方面，主张：①打破一切虚伪的不平等的制

度；②唤起青年向上的精神，使之自拔于黑暗社会；③促进“互助”、“团结”的美德，以训练团结生活。

文化方面，主张：①积极灌输新思潮，以唤起青年底知识欲；②改造因袭的人生观，使一般人得着“人的生活”；③铲除一切占据思想界底旧权威的黑暗势力；④促醒教育根本的注意点……

这篇发刊宣言，实际反映了逸群同志初步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观点。他回贵州时，曾作了细致深入的观察，又在旅途中经过湘西到长沙一带，耳闻目睹军阀赵恒惕割据湖南压迫人民的种种事实，从而更坚定了他打倒军阀、拯救中国的信念。他在《贵州青年》上除执笔撰写这篇宣言外，还根据我们的商议，以“黔铁”的笔名撰写了《贵州问题的先决问题》一文，指出当时的贵州应当拥护孙中山先生的护法事业，抵制北洋军阀走卒袁祖铭回黔。《贵州青年》发刊后，即得到团刊《中国青年》主编之一肖楚女同志的热情支持。在一九二四年六月出版的《中国青年》第三十六期上，楚女同志写道：

黔铁君对于一般抱狭隘嫉滇主义的贵州人，予以纠正，说贵州人在此时，切不可因为恨唐继尧底滇军而走错路——去欢迎直系势力袁祖铭回黔驱滇。因为贵州“实在是屹立西南，始终和北洋军阀对抗，为着民国奋斗的。”“今天西南尚在继续护法事业联合努力革命的程期中，贵州既和西南各省有不可分割的历史关系”，故贵州人今日是不能让“任何反动势力侵入，将它原有的个性摧残，使它的地位和精神，从此与它的环境永陷于矛盾和冲突的悲境”的。这是一个何等周到的政治见解，何等远虑的革命态度！

肖楚女同志的文章，鼓舞了逸群同志和《贵州青年》全体同志，从而更增加了我们要努力办好这个刊物的信心。逸群同志继



这是周达群同志等于1924年在上海创办的
《贵州青年》第四期封面。
(唐承德 摄)

续写了很多重要文章，在《贵州青年》第六期发表的一篇题为《精神附北与实质附北》的文章中，逸群同志着重揭露和分析西南军阀投靠北洋军阀的罪行，指出赵恒惕、刘湘是精神附北派，刘存厚和袁祖铭是实质附北派，文章说：“精神附北与实质附北，性质虽异，而同为附北。我们既站在民主主义旗帜下说话，自然应该一律加以攻击。”最后，文章作了这样的结语说：“对于实质附北的袁祖铭，由种种地方证明，实在是绝望。对袁个人，虽然绝望，对黔军全体，仍抱着无穷希望。但是在他们未驱逐实质附北的袁祖铭，与西南民主派合作移师声讨曹、吴及服从革命领袖孙中山先生之命令之前，我们仍然是毫无疑义地攻击他们的附北行为。”

《贵州青年》传到贵州后，产生了一定的革命影响，特别是逸群同志的文章，击中了贵州反动当局的要害，一般军阀，官僚、政客们恨得要死，就采用卑劣手法，向《贵州青年》寄来了谩骂、诬蔑的恐吓信，信中还附绘了一只手枪对准《贵州青年》的图画。但是另一方面，我们却收到了来自家乡和分散在北京、南京、天津及上海的贵州学生写的信，对《贵州青年》表示同情和支持。当时在北京朝阳大学就学的胡秉铎同志，就寄来了热情洋溢的赞助信，从此，秉铎同志也就成为我们刊物的主力之一，他用“赤光”的笔名，在第二、三、四等期中发表了《残废的三个人》《攻敌》《恶政府的势力》《寂寥的夜》等战斗性文章。

自从我们得到肖楚女同志在《中国青年》发表对《贵州青年》鼓励的文章后，我们更加认真阅读党的刊物《向导》和团刊《中国青年》。逸群约我联名写了一封信给楚女同志，表达我们想同他会面求教的心愿。此信发出后，等候了十来天不见回音，不免有些抱怨。正在这时，楚女同志在一个黄昏时刻来到《贵州青年》社访问我们，我们当时那种喜悦的心情和楚女同志爽朗的说话声，至今我还记忆犹新。楚女同志在同我们亲切的谈话中，除

积极鼓励我们外，还对《贵州青年》的一些缺点提出了坦率而含蓄的批评意见。从此，我们就把楚女同志看成是良师益友^①。在他的帮助下，我们进一步认清了中国革命的前途。

那时，孙中山先生在广州高举民主革命的旗帜，在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于一九二四年元月在广州召开了以改组为中心内容的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了著名的《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对三民主义作了新的解释，发展成为反帝反封建的、包括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的新三民主义。逸群同志在政治上感觉很敏锐，对新鲜事物的接受力很强。他当时在《贵州青年》上接连发表了《三民主义与贵州》、《贵州青年对贵州政治应有的主张》、《军人的头脑》、《女子底自由在哪里？》等论文，从反帝反封建的立场上阐述了一系列问题。这些论文题目，现在只能从当时国民党左派报纸《国民日报》副刊《觉悟》上刊登的《贵州青年》每期目录中看到，原文已经无法找到了。从此，逸群同志特别注意广州的革命动态。当时黄埔军校已建立，一天，我们忽然接到在黄埔军校任总教官的何应钦的来函，他除对我们在《贵州青年》发表的文章表示倾慕的心情外，并特别提出邀约逸群和我去黄埔工作。记得逸群当时曾表示说：“我要去黄埔么，那就不是去当官而是去当兵。”原来他那时已能认识到武装斗争的重要性，准备从当兵做起学会掌握武装。在这稍后一点时间，他在实践去黄埔当学生的意愿时，曾写给我一首诗，内容是：

废书学剑走羊城，只为黎元苦匪兵；
战伐相争廿四史，岂无白刃可亡秦？

^①原来我们以为当楚女同志是女同志，见面后才知道是男同志。我曾写了这样的诗句赠他：“原来楚女非巾帼，忧国忧民慈母心。诛伐魑魅如椽笔，九州风雨一奇人。”——作者注

逸群的这首诗，是在我已到黄埔军校校长办公厅任特别官佐职以后，他正要离开上海去黄埔时写给我的。这首诗表达了他从事革命的抱负，也表明他对中国革命需要武装力量有了一定的认识。他到黄埔的时间是一九二四年九月间，他到得这样迟，是由于丢不下《贵州青年》的编辑工作。他对这个刊物，是倾注了全部精力的，除经费由他负担外，一切审稿、编排、校对、发行等工作，他都担负了主要的责任。他进入黄埔军校第二期辍重队后，在极繁重的军事学习中，还挤出时间，参与编辑了三期《贵州青年》（移在广州出版）。他一生就是这样不知疲倦地、顽强地工作。

逸群同志到广州，携有恽代英同志介绍他去会见中共广东区委组织部长穆青同志的信。他一到黄埔就告知我，他已决心做一名共产党员，肖楚女、恽代英都支持他，穆青见到他后也表示同意。因此他到黄埔入伍不久，就由军校特别党部负责人鲁易、吴明两同志介绍入党，成为中共正式党员。自此以后，他就在党的领导下全心全意地做了大量的工作。

那时的黄埔军校，是在苏联提供军事人才（苏联顾问）、新式军械等项援助下建立起来的。党中央派了周恩来、聂荣臻、鲁易等同志建立了政治部，建立了国民党特别党部^①，政治部主任即由周恩来同志担任，并派了许多党、团员到军校学习，形成了坚强的革命骨干。逸群同志在到校后会见周恩来同志时，周恩来同志指示逸群：对外以国民党员身份出面为宜，不要透露共产党员身份。逸群同志首先参加了刚建立不久的“火星社”的活动，这个社是以党、团员为骨干的党的外围组织，是周恩来同志发动的，取名“火星”，是采用列宁创办的《火星报》的名称。逸群同志未入校前，是由第一期的党员学生蒋先云、李芳

^①当时黄埔军校国民党特别党部是由中共党员和国民党左派组成的。

工，黄锦辉等几位同志领导这个社的工作。逸群入校后就成了这个社的积极分子。蒋先云同志曾告诉我说，逸群同志的精力真是非凡，他在刚入伍时那样繁忙的学习生活中，为要了解一些新社员的情况，总是逐个地同他们深入接触，并如期地将所了解到的社员情况列表详细汇报。这就为建立中国青年军人联合会打下了基础。

建立中国青年军人联合会，是恩来同志在一次出席广东区委会上提出的建议。粤区委书记陈延年同志表示赞同，认为通过这个外围组织，可以团结更多的革命军人在党的周围，发挥军队中统一战线的作用。后恩来同志指定逸群同志为青年军人联合会主要负责人，由第一期学生蒋先云、左权、陈赓等同志协助之，教官和队部官员中有金佛庄、茅廷楨、徐坚等同志参加。青年军人联合会于一九二五年二月一日举行大会宣布成立，逸群同志为青年军人联合会制定了简章，当即被推定为青年军人联合会主席。开始时青年军人联合会只限于在黄埔军校内发展会员，后来，会员发展到驻粤的滇军干校教导团、湘军讲武堂、粤军宪兵营、鄂军讲武堂以及部分的海军中，至九月间，青年军人联合会会员已达到二万多人之众。这时，恰好逸群同志学习时间届满一年，毕业了，恩来同志决定留他在军校政治部，专门主持青年军人联合会的工作。从逸群同志的个人意愿说，他是一心一意要拿枪杆子的。当时恩来同志对他做了思想工作。记得逸群同志曾向我转述恩来同志是这样对他说的：就你个人来说，你现在去带兵，至多带一营一团吧，而做青年军人联合会的工作则是两万人的工作，其影响当然还不只这两万多人。这样，逸群放弃了个人意愿，服从了组织的决定和革命的需要。从此，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中，逸群就专心致力于政治思想工作。他主持创办了《青年军人》《中国军人》两个刊物。在这两个刊物上，他陆续写了很多重要文章。从他这一时期写的文章看，他已能基本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

场、观点、方法分析问题的实质，是一个比较成熟的马克思主义者了。他在《青年军人》第五期发表的《说牺牲》一文，是针对当时黄埔同学在东征讨伐陈炯明的战争中如何正确对待牺牲精神而写的，文章写道：“我们革命，是为要解放我们被压迫的民族，实现我们的主义，不是有意拿我们的头颅，去换什么‘烈士’的头衔的。”因此，“我们只看他是否恪守党的纪律，能否尽忠他的职务，便可以知道他有无牺牲的精神。”在《中国军人》第七期上，他以《外祸与内忧》为题写道：“中国现时之民族革命运动，从‘五卅’事件而充分证明劳动者之特殊势力，其不妥协精神，实远在各阶级之上。……中国民族革命之成功，必在打倒一切帝国主义之后，而打倒一切帝国主义，惟有中国的劳动阶级，有此决心，有此力量。”他已明确提出中国革命的领导权问题，指出劳动者（工人阶级）的“不妥协精神实远在各阶级之上”，实质是将中国共产党对革命的领导权问题揭示出来了。

逸群同志在大革命初期负责主持青年军人联合会的工作，始终是在中共两广区委和周恩来同志的领导下进行的。他不仅在两个刊物上发表了很多重要文章，而且在行动上运用青年军人联合会这个组织进行了大量工作，特别是在对黄埔军校中一些右派分子的斗争中，坚持了正确的原则。到一九二五年十一月间，作为黄埔军校校长的蒋介石，还伪装成左派的姿态出现。但伪装毕竟是伪装，周恩来同志在同他朝夕接触中，已觉察到这个“左派”的手法，在一次党小组会上向同志们提出警告。逸群同志在这个会上反映蒋是怎样约他个人谈话，约他到家里作客，说什么“你是我的好学生就不应听信共产党”等等。那时两广区委的任务，既要同国民党右派斗争，又要同党内陈独秀投降主义思想影响斗争。在进行党内外斗争中，周恩来同志捍卫了党在革命统一战线中的领导权，而执行最力的就是逸群同志。当时国民党右派分子戴季陶和伪装左派的蒋介石，目睹周恩来同志在军校中有了崇高威望，怕得要死，恨得

要命，于是积极密谋策划反共。戴季陶抛出《孙文主义之哲学的基础》一文，印成小册子四处散发，宣扬臭名远扬的戴季陶主义。这个右派的政治目的是明目张胆地破坏孙中山先生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与此同时，蒋秘密指使他的亲信，训练部主任三柏龄和教官缪斌以及学生贺衷寒等出面，欺骗和诱使一些学生、教官等组成孙文主义学会以与青年军人联合会相对抗。自此以后，由两会集中反映的国民党左右派的斗争白热化了。正当此时，逸群和蒋先云同志负责编辑的《青年军人》周刊（后改为旬刊）发表了张伯简同志的《社会发展史》和我在《悼念孙中山先生专刊》中写的《从唯物史观看中山先生死的问题》，这两篇文章就成了孙文主义学会中一些人大肆咆哮的把柄，这些人攻击这两篇文章是违背三民主义的共产宣传，是“侮辱”了孙中山，以此当成攻击青年军人联合会的箭靶。又在这时，校政治部一位机要秘书同志不慎丢失了一份我写给“君伟”（军委）的党内报告，报告中对全师官兵思想动态作了分析，中有“非同志何应钦属于中派”等字句。孙文主义学会一些人获得这份报告后，把它影印出来四处散发，作为反共叫嚣的材料。孙文主义学会成员杨引之、潘佑强等还据此来向我和逸群同志寻衅，我们据理力争，由于真理在我们手中，终于使这些人阴谋不能得逞。那时，我同周恩来同志都在汕头，恩来同志任东征军纵队总指挥部政治部主任，我任第一纵队政治部主任，孙文主义学会一些人窜到汕头跑到我主持的政治部寻衅，并向蒋介石告状。我接受两广区委指示向蒋提出辞呈，即随周恩来同志离汕头回广州。在这段时期，形势的发展，暗流益急，到一九二六年三月二十日事件（即“中山舰事件”）后不久，约在一九二六年五月间，蒋对青年军人联合会在军队中的影响日益疑忌，就以“亲爱精诚”的校训为幌子将两会（青年军人联合会、孙文主义学会）解散了。这当然只是名义上的解散，两会的斗争依然发展下去。“大佛寺枪击事

件”就发生在两会刚解散的时刻。

一九二六年五月间，正是北伐战争的前夕，作为革命根据地的广东，经过镇压商团事变^①，两次东征^②，并取得肃清刘、杨叛乱^③等战争的胜利，已完成广东革命根据地的统一，奠定了北伐的基础。革命形势的发展迅猛异常。与此同时，国民党内部左、中、右急剧分化，形成革命与反革命的尖锐斗争。当时，蒋介石被推上国民革命军总司令的高位，周恩来同志任政治部主任。两广区委对北伐战争形势作了全面的分析和估计，认为西南区是革命力量较薄弱的环节，何应钦任军长的第一军，在该军工作的重要共产党员已被全部排除；朱培德（当时的左派）统率的第三军成份复杂；另外，刘、杨残部改编在第二、第四军中的川桂官兵更需要

① 广东商团，是香港英帝国主义支持下的一个买办资产阶级的反动武装组织。以英国汇丰银行买办陈廉伯（国民党右派分子）和佛山大地主陈恭受为首。一九二四年十月十日，商团军在广州屠杀游行示威群众。事后，他们竟张贴胁迫孙中山下野的布告，用武力威迫商人罢市，准备和英帝国主义的走狗陈炯明里应外合，夺取广州革命政权。十月十四、十五日，孙中山在共产党的帮助下，采取了坚决镇压的政策，用革命武装击溃了反动的商团军，使广州的革命政权得到了初步的稳定。

② 两次东征：当时，军阀陈炯明依靠英帝国主义和段祺瑞的军事援助，准备进攻广州，摧毁革命政权。为了打破陈炯明的反动企图，在中国共产党的倡议、领导和支持下，革命政府于一九二五年二月一日开始了第一次东征，战争进行了将近两个月，肃清了除惠州以外的广东东部的陈炯明势力。同年十月上旬，国民革命军举行第二次东征，十月十四日即攻破了陈炯明的老巢惠州，二十八日在梅林一带歼灭陈炯明的主力，十一月四日收复潮汕。陈炯明在东江的势力至此全部崩溃，东征取得了彻底的胜利。

③ 刘、杨叛乱：桂军总司令刘震寰和滇军总司令杨希闵，与英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唐继尧、陈廉伯等早有串通，企图推翻革命政府。从一九二五年四月起，刘、杨陆续将军队从东江撤回，威逼广州。六月间，广州危急。在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廖仲恺等的坚决主张下，撤回东征的黄埔军校学生军等部，讨伐刘、杨。交战仅一天半，六月二十日，滇、桂军全部瓦解。这一反革命叛乱被平定，使广东革命政府转危为安。